

# 文化生态圈关联发展视角下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思路

刘军民 李琳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内容提要:**史前遗址是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对于无法依赖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研究而言,史前遗址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来源。史前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因其年代久远、破坏严重、与自然环境关系紧密、可观赏性差和大众不易识别等特点,保护和利用受限,不被社会普遍重视。利用文化生态圈层的关联发展理论来保护史前遗址,将史前遗址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所在地的文化精神相关联,与区域发展相联系,有助于我们拓宽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思路,创造良好的观赏环境,推动此类遗产的展示与利用。

**关键词:**史前遗址 保护利用 文化生态圈 关联发展 环境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史前遗址是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今天的我们了解早期人类社会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与遗迹和遗物形式丰富多样的历史时期遗址相比,史前遗址的可观赏性、可读性均较差,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利用史前遗址一直是遗产领域的难题。目前虽已有建立博物馆、城市公园、考古遗址公园等保护方案,但各有缺陷:博物馆的保护方式多为可移动文物展示,体现为静态知识传递;城市公园充分利用了遗址空间,但考古知识传递较少;考古遗址公园主题不集中,表现为前二者的形式组合。所以,三者均存在互动性、可读性差等问题,对史前遗址来说适用性较弱。因此本文基于文化生态圈层的关联发展理论,将史前遗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相结合,与所在地的文化精神相关联,与区域发展相联系,以期拓宽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思路。

## 一、史前遗址及其特征

史前遗址是人类在史前时期生产、生活留下的遗存,反映了史前先民生产技术、生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 (一)史前遗址的重要性

史前遗址作为人类史前活动和远古记忆仅剩的残留片段,是人类认识自己发展过程的可靠信息来源。史前遗址内出土的陶、石、玉、骨等类遗物及保留下的土、木、石等材质的遗迹,不仅是文明起源阶段原始艺术真实的反映,也是先民生产及生活的智慧劳动结晶<sup>[1]</sup>。

史前遗址具有深厚且多面的价值,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它既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遗址所在地区乃至国家、民族的文脉之根。研究、保护、展示并利用史前文化遗产对于追溯地区文明起源、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地方文化品位、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进而提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影响力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sup>[2]</sup>。史前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不仅可以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可以探索“我们要到哪里去”,更可以对“我们现在怎么做”提供借鉴。

## (二)史前遗址的特征及利用困境

我国史前遗址数量众多,中国境内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达三百余处,大部分省份皆有

收稿日期 2017-12-08

作者简介 刘军民(1972—),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文化遗产与区域发展。

李琳(1994—),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丝绸之路视域下西部生态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互动机制研究”(146GL165)。

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一万余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数目繁多,可分以下几大考古学文化区系: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sup>[3]</sup>。史前遗址遍布全国,其保护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与史前遗址距今年代久远有关,同时破坏严重、可观赏性差和大众不易识别等特点也造成史前遗址在展示利用上存在困难。

我国现存的史前遗址主要有以下特征。

#### 1. 占地面积大,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

由于史前时期的技术限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并且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强。面对自然,史前人类与之相处的方式更多是适应。例如居址的选择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旧石器时代人们多寻找依山傍水、天然避风的洞穴,新石器时代因种植需要对水资源更加重视。除此之外,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多占地面积较大,如聚落或城址,并且大多数位于今天的城乡结合部,或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随着城市的扩张,人类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不断蚕食并破坏遗址,这些活动不仅破坏了遗址环境,也对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造成巨大影响。比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已被城市建设紧紧包围。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解决区域内发展与保护遗址的矛盾,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 2. 时间久远,持续利用,破坏严重

在史前时期的技术条件之下,先民们根据生存的需要挑选易于谋生的区域作为长期活动的地点,但那些条件优越的生存地点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大多数的史前遗址可能经历过人类反复和持续的利用,遗址在不断被叠压打破的同时,也不断有新信息融入,这就使遗址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一处遗址可能包含多种文化内涵。但史前遗址的本体与环境本就原始且简陋,再加上人类持续的破坏活动,让遗址的可观赏性变得更差<sup>[4]</sup>。就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地层堆积中既有齐家文化的陶片,也有汉代及以后的砖、瓦、瓷片之类<sup>[5]</sup>。该遗址作为甘肃三大齐家文化遗址的唯一幸存者,却也因时间洗礼和现代建设活动而受到严重破坏,遗址面积急剧减少。这些特点给史前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造成了极大困扰,使其难以被一般参观者理解,因而其保护利用较难得到普通大众的关注与支持。

#### 3. 遗址本体及出土物原始特征强

从史前遗址本体来说,不论是天然的石制洞穴、土木结构的建筑基址,还是先民生活留下的痕迹,都在可视性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同时也让缺乏考古学基础的普通游客难以理解和欣赏。

从遗址出土物来说,其大多为原始的石、骨、木、陶类的生产工具以及生活用品,也有人类食余的难以分辨的动植物遗骸。而纹样精美的玉器虽然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大量发现,但并不是普遍存在。史前遗址的出土遗物以朴素的陶器和石器为主,与历史时期的青铜器和金银器相比,整体上艺术性、可观赏性弱,视觉冲击力不够强。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众多史前遗物即使配有文字说明,多数人仍难以理解,比如打制石器与天然石块的区别。因此,史前时期的遗物与遗迹虽然价值重大,却往往无法引起参观者的共鸣,难以激发参观兴趣。

## 二、关联发展理论及其在史前遗址的适用性分析

### (一)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文化生态学是伴随20世纪中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由对立走向共融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从学科来源和构成来说,文化生态学就是将生态学的方法用于文化化学研究的新型交叉学科,旨在研究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sup>[6]</sup>。

文化生态学主要观点是,文化的发展与其特定的环境密不可分,文化受到环境影响的同时,对环境也有重新塑造的作用,就在二者互相影响的过程中,特定的地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系统。它主张从人、自然、社会与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sup>[7]</sup>。

### (二) 文化生态圈关联发展理论适用性分析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生活的地球就是一个完整而合乎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自然生态圈。在整个自然生态圈中,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同构成完整的圈层系统,而物种与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间的关联发展使生态圈内部达到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从而达到物种共生态的和谐状态,它们互为联系、共同发展。

我们可以将物种共生态的原理运用到文化生态学中,将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依存关系称为文化共生生态。而文化生态圈就是指一定区域或范围内的人群或人类社会在共有的宗教、心理、信仰、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相

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sup>[8]</sup>。世界上存在多个文化生态圈,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共进,及不同文化种群的共生就可以称为文化共生态,换句话说就是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而要达到二者的平衡,就需要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关联发展、互相推进,共同促进文化生态圈的和谐状态(图一)。

清华大学文小勇先生强调:“发展有一个特征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那就是同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所有的发展和进化形式来说都是基本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也如此。一旦离开了一定程度的同一性或多样性,任何事物都不能成长和发展。”<sup>[9]</sup>而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就是各要素间的关联发展。

不论是小到原子,还是大到人类社会,都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序组合,都因各部分因素关联发展才得以存在。关联发展的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两类。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同学派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等<sup>[10]</sup>。环境孕育文化,文化改变环境,只有二者和谐共处、关联发展,才能达到双赢局面。

而史前时期,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人类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强,临水便多发展渔猎,靠山就多采集狩猎,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史前时期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源头阶段,先民们对于生死、天地的看法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人的思想。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孕育出史前文化,史前遗址体现所在地的精神与文化,同时大区域内文化与文化之间互相影响或继承发展,可以说,史前遗址与所在地

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联发展、互相影响。

### 三、关联发展理论对史前遗址保护利用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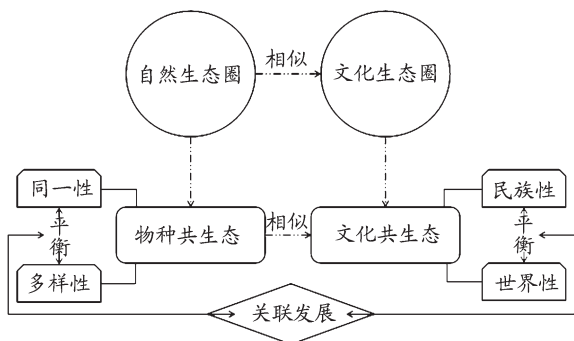
基于史前遗址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密切的特点,关联发展的理论可以为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较好的思路,即将史前遗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相结合,与其所在地的文化精神相关联,也与大区域内其他遗址及产业相协调,构建区域内的文化系统,提高区域竞争力。

#### (一)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史前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如若脱离自然大环境的因素,就无法让公众产生直观感受与体验。因此,保护利用史前遗址,一方面要借助遗址本身所处的环境,建设遗址公园,优化遗址环境,增加绿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休闲空间;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模拟原始环境,令史前遗址的展示方式多样化,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史前文化的内涵,从而增加史前遗址的可读性与观赏性。

在复原展示时,不必局限于现今流行的一小块区域的模拟(粗糙的人类模型、塑料的树与栏杆等),而应依托洞穴、峡谷等遗址的自然环境,模拟复原史前生产生活方式,让游客亲身体验加工石器、制作陶器的过程,让大家对于石器、陶器的使用和分类有更好的理解。还可以复原史前人类半地穴式或干栏式等不同形式的住所,建成旅馆,让游客感受建筑的智慧与变化,警惕环境的恶化与人类无休止破坏带来的影响。复原原生环境时,要考虑植物的选择和空间安排,不能只追求现代景观小品的设计,要最大程度给予游客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史前遗址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也能增加公众对史前文化的理解和兴趣。

在自然环境的利用方面,我国台湾卑南遗址文化公园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卑南遗址是台湾地区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史前遗址,具有完整的聚落型态,也是环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遗址,年代跨越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公园以“文化再生,环境再现”为理念,将遗址视作一座苍穹博物馆,将遗址内的重要堆积现象于原址保存与展示,而且整个公园以地域性的原生植栽为陪衬,充分表现其史前自然情景<sup>[11]</sup>。公园考虑到遗址地下遗物分布之疏密,采用草坪、疏林、密林等方式区分,同时顺应公园冲积扇之地形,依植物自然分布情形进行分区规划。卑南遗址文化公园的自然环境不



图一 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关联发展类比图

仅是其遗址分布的体现和卑南文化的反映,也为依托公园所设计的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背景,是兼具自然与文化环境资源的学习中心。

再如陕西洛南县的花石浪遗址,作为洛南旧石器群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人类居址,在二十余平米的洞穴及洞口附近出土了七万余件石器,发现哺乳动物化石二十多个种类,数量之大极其罕见,其意义可见一斑。但该遗址如今仅剩两处裂隙形洞穴,可观赏性较差。考虑到花石浪遗址的展示,我们不仅可以针对它的两处洞穴,恢复部分考古现场和地层剖面,还可利用洞穴所在的花石浪山创造集自然环境与史前人类居住洞穴为一体的文化与生态双重旅游体验,优化山体环境。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修砌陡峭的山路,让游客体验史前先民艰难的生存条件;也可在上山下山的道路上设置动物模型,引导游客认识史前物种;在洞口较平坦的区域设石器加工体验区,让游客体验打制石器的过程。游客通过探究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对比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在思考中感知社会进步与发展,并激励游客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去努力奋斗,这也是史前文化的教育价值与传播价值<sup>[12]</sup>。

### (二)与所在地的文化精神相关联

这里所指的文化精神是指史前人类带给我们的非物质的遗存与万年来遗址所在地所孕育出的地方文化与精神。这里强调的是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结合,也强调对当地文化的关注。史前遗址不仅留下物质性的遗物与遗迹,还留下了区域文化的根源、民族历史的文脉。将史前遗址与所在地的文化精神相关联,可以增强当地居民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也为参观者了解地方文化渊源提供了良好而直观的载体。

考古发现的图腾纹饰、聚落布局等都体现着先民的智慧,万年来遗址所在地所孕育出的地方文化与思想更是一个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精神根源。我们可以利用图片、文字、数字化展示和现场表演等多样的形式来展现史前遗址留下的精神与文化,也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活动,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弘扬地方历史文化。

辽宁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是中华大地上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其规模宏大,出土遗物丰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它也是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祭祀性遗址群,遗址群内分布着国内同期罕见的祭祀性建

筑,积石冢内的石棺墓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精美玉器<sup>[13]</sup>。

在牛河梁遗址的展示利用上,应重点突出遗址的宗教祭祀性质,将物质遗存与非物质文化景观展示相结合,用科技手段模拟再现考古学家所推测的当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过程;可邀请志愿者在节日期间模拟古代祭祀礼仪表演,让游客也能参与其中,直观感受先民的精神活动;还可以通过实景舞台剧等展示方式合理活化黄帝、女娲时代的传说,增加可视化效果。祭祀场地若以女神庙遗址为依托,则更能令游客感受到历史的氛围;再结合今天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朝阳红土泥塑”,让游客塑造自己的“女神”,引领大家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更好地保护并传承具有独特艺术性和鲜明民族性的文化遗产。

### (三)与区域内其他遗址及产业相协调

区域是遗址所在的大环境,史前遗址不能脱离区域而发展。要让区域的发展与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相协调,区域的发展推动遗址的保护,遗址的利用为区域带来文化吸引力,实现遗址与区域的互惠互利。

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要与区域内其他文化资源相关联,与其他遗址和产业共享不断进步的交通、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遗址保护工作要将区域内不同类型的景观结合起来,加强景区与景区间的联系和发展,构建区域内的文化体系,创造发展相关绿色文化产业,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综合竞争力。保护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发展自然景观、文化景观相结合,史前文化、历史文化相结合,物质遗存与非物质遗存相联系,历史与现代关联的多样文化区域;通过文化产业体系的完善带动周边经济的增长,同时反馈于遗址公园的保护开发,形成良性循环的遗址公园保护开发模式。具体实践中,可以采用“遗址公园+旅游社区”的发展模式,使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契合,展示蕴含在史前遗址中的核心文化价值。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良渚遗址突出的文化价值与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申遗的必备条件。为提升良渚博物院的整体品质,当地政府对博物院周边54公顷的环境(原先分布有石矿、化肥厂和沼泽池)进行了整治、开发与建设,对古城内5000多亩农

田进行土地流转,恢复水稻、油菜等传统农业,引进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型产业,通过倡导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产业发展与遗产景观的深度融合<sup>[14]</sup>。在该遗址的保护利用过程中,地方政府建立起良渚遗址公园、良渚博物院和良渚文化产业园三者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形成一个集遗址保护、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为一体,山水、人文、古今和谐的“大美丽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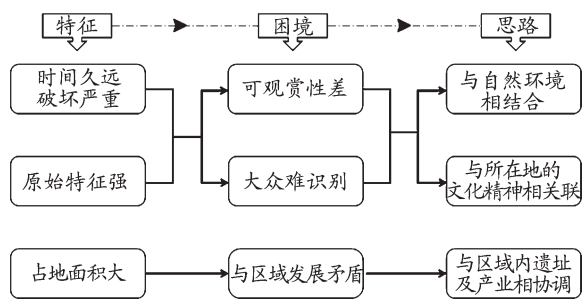
在良渚遗址以东区域建设的梦栖小镇非常注重良渚文化基因的传承。该区域以文创和旅游为主要支柱,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产业活力的美丽城镇;并借势遗产保护培育以文化创意、规划设计为主体的零污染产业,包含了玉文化产业园、玉鸟流苏创投街区及各类产业园,它们与遗址环境相得益彰、和谐共存<sup>[15]</sup>。此外,良渚区域还将打造“四纵五横”的路网体系,打通良渚新城与杭州主城、未来科技城及新城内部的主通道,缩短良渚遗址与西湖景点的距离;远期还考虑通过串联水系,打通京杭大运河与良渚遗址这两个文化遗产<sup>[16]</sup>。

遗址与绿色产业的结合,增加了遗址的经济效应,扩展了遗址的知名度,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和参与感,也促进了所在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可以说,通过遗址文化的挖掘与产业化,当地已初步实现了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协调与相互促进<sup>[17]</sup>。

#### 四、小结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不论是自然地理状况、政治制度,还是区域内多样的文化,所有一切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因素都是文化生态圈层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圈层中各种因素关联发展,才能达到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推动文化不断进步。史前时期作为文化的源头时段,其遗址反映了与环境有关的诸多信息,因此在保护与利用史前遗址时,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大区域内其他遗址及各产业都应统筹考虑。将史前遗址与影响它的各项要素联系起来,更加立体地展示可读性与观赏性欠佳的史前遗址,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图二)。

遗址的保护工作要与自然环境结合,与所在地的文化精神相关联,与区域内其他遗址及各项产业相协调。我们可以借鉴“互联网+”,构建“遗址公园+”模式,达到“1+1>2”的效果。所谓的“遗址公园+”是指在遗址公园达到其原有功能的前



图二// 史前遗址发展思路

提下,实现产业体系的全面发展,并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而遗址公园建设需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时在公园景观设计上尽可能在植物的选择和空间安排上复原其原生环境,赋予游客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生态圈层关联发展的理论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前遗址的解读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将那些遗址类型较丰富、意义较重要、所处环境较原生、交通较便利的史前遗址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相结合,与其所在地的文化传统相关联,与大区域内其他遗址及产业相协调,构建“遗址公园+”模式,从而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遗产保护工作要立体、多样地展示史前遗址,全面阐释史前信息,从而让公众了解史前文化,帮助公众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公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进而使公众更加尊重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惠昭:《史前遗址的展示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史前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桂林共识》,西安半坡博物馆、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编《史前研究2010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3]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4]同[1]。

[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6][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潘艳:《文化生态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7]唐大鹏:《构建中原体育城市文化生态的路径探析——基于郑州都市区战略视角》,《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8]文小勇:《论文化生态圈与文化安全》,《思想战线》2002

- 年第4期。
- [9]同[8]。
- [10]梁渭雄、叶金宝:《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 [11]陈洪波、宁海珍:《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 [12]刘敬华:《红山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区构建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13]潘臻:《大遗址保护视野下的牛河梁遗址展示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14]陶李:《良渚古城遗址:借申遗东风创保护新路》,《中国旅游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 [15]康齐:《千年古城良渚迎来新“曙光”》,《杭州日报》2018年4月8日第1版。
- [16]同[14]。
- [17]姜克芳、姚梓阳、周洋岑:《史前遗址的保护利用模式:体系、现象与关键——以秦堂山遗址为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编《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

##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rehistoric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rel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phere and Ecosphere

LIU Jun-min LI Lin

(College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Abstract:** Prehistoric sites contain the remains of prehistoric human activities. They are the only reli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prehistoric archeology, which lacks written records. Prehistoric sit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re of great value. However, due to their prehistoric age, poor condition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acks of aesthetics appealing and public recognition, they are not valued by society and limited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have been performed. The adop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correl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phere and ecosphere may help connect prehistoric sites to their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to the local cultural spirits, and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may also help broaden the thoughts on prehistoric sit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create a good visit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presen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uch heritage.

**Key words:** prehistoric sit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cultural sphere and ecosphere; correl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责任编辑:王 霞;校对:张 蕾)